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三十年

□庄福龄

哲学社会科学30年

成龙配套　初具规模

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作为一门新建学科，从我国第一本新编教材《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稿》1981年问世，到去年纳入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第二批重点教材《马克思主义哲学史》重新启动，近30年了。其间，这一学科的研究成果大量涌现，研究范围不断扩展，学术质量继续提高，同时专业队伍也逐渐形成。举其大者，有1983年和1986年两度列入国家“六五”和“七五”规划的重点图书《马克思主义哲学史》8卷本，该书于1996年全部出齐，先后获“五个一工程奖”和国家社科基金优秀成果一等奖等，入选《中国文库》；有1987年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史部分，编写条目近200个；等等。同时，关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传播史和毛泽东哲学思想史、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等方面的研究成果不断问世，不同类型的教材和有关哲学思想的专题史更是异彩纷呈，专业辞书和资料书也为学科建设争得了一席之地。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整体研究取得重大进展，其中4卷本的大型专著《马克思主义史》获“五个一工程奖”和国家图书奖提名奖，入选《人民文库》；1卷本的《简明马克思主义史》先后被列为21世纪课程教材和“十五”国家级规划教材。可以说，这些教材是先前众多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教材进一步展开和深化的结果，也为今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教材编写和学科建设奠定了重要基础。

实事求是　稳步发展

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近30年的学科建设，总体上是一个不断积累、蓄势待发的过程。

发展，不是直线式上升，不是从一个高潮到另一个高潮，而是有起有伏的。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的近30年看，第一个10年是编写教材和撰写专著并举，为8卷本《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作酝酿和准备的阶段；进入第二个10年以后，一方面有争相问世的多种类型教材热、社会上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办班热，另一方面因为某些学校调整计划，也出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课时减少、人员紧缩甚至课程停开的情况；到了第三个10年，以多卷本《马克思主义史》问世和对马克思主义史整体研究的展开为标志，在学科建设上重新出现了新的发展势头。新世纪之初，中央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以此为契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以及其他众多学科的建设开创了新局面。

发展，尤其是思想理论的发展，需要有一个孕育成熟的过程。改革开放之初，从世界上看，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马克思主义正面临严峻挑战，反社会主义、反斯大林之风形成全球思潮；从我国来看，刚刚走出“文化大革命”的阴影，拨乱反正还没有完全结束，对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的科学评价还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重大政治问题和理论问题。根据当时的历史条件，我们在第一本新编教材中，实事求是地把下限写到斯大林执政时期，不急于触及那些尚待总结和尚未作出结论的历史。这本教材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处理，既突出了马克思、恩格斯开创性的奠基作用，也反映了列宁、斯大林在十月革命前后对继承、捍卫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作出的重要贡献。这一处理在当时是合适的、主动的，也为随后的历史研究主要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历史研究作了一些前期准备和铺垫性工作。

发展，需要培养一支合格的专业队伍。人才培养是学科建设一项长期的战略任务。不论编书还是育人，归根到底都是为了培养合格的教师和学生，为了提高教学双方的理论素养。从当年参加8卷本《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编写的成员来看，57人中已有10人过世，健在者最年轻的也已近花甲。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作为新建学科，既有历史短、积累少、队伍小的特点和不足，又有其他学科所没有的更高要求，如要求有阅读德文版和法文版马克思、恩格斯原著和有关文献的能力，要求有广博的知识和较高的理论水平等。这样的人才，既要从年青的大学生和研究生中选拔培养，也要从有关的课题组成员中选拔培养。

学科建设必须坚持统筹兼顾。学科建设是一个整体，互动互补才能相得益彰。从一个学科的整体来看，既要有教材，又要有专著；既要有大众化的读物，又要有品位较高的学术著作；既要有系统的、翔实的资料书，又要有科学的、准确的工具书；等等。而从一个学科的内涵来看，从它所覆盖的历史来看，既要突出重点，又要照顾全面。研究无止境，学科建设也无止境，既要开拓又要深化，要力求门类齐全、视域宽广、成龙配套。而目前的现状是，为广大人民群众喜爱的大众化读物还凤毛麟角，史料翔实的资料书和准确鲜明的工具书还种类稀少，各种有关的专题史、断代史、人物史尚待有组织地编写出版，不少单薄的环节需要加强、研究的空白和断层需要填补。这说明，我们的学科建设任重而道远，还有很多工作要做，需要积累，需要时间，更需要研究。

继往开来　开拓创新

学科建设的未来是大家关注的问题。回顾历史，面对现实，我们充满信心。30年的历史不算长，却有了一个好的起点和好的传统。当务之急是紧紧把握机遇，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学科建设。

深入研究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30年来改革开放的历史，也是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历史。应深入研究这段历史，深入研究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进一步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更科学地总结过去、开创未来。

科学总结我国近90年马克思主义哲学传播的历史，特别是总结近60年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创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新局面的历史。毛泽东同志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开创了中国革命道路，创造性地提出以整风形式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从思想上建设党等思想，并对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作出了独创性贡献。只有深入研究这段历史，才能更好地认识我国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历史。

系统研究160年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史。首先要研究19世纪后半叶马克思、恩格斯为奠定马克思主义的基础而作出的艰难探索，研究他们为人类作出的创造性贡献。基础理论是万古长青的，是我们必须长期坚持的基本原理和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立场、观点、方法。马克思、恩格斯的真知灼见和科学论断，永远是我们学科建设的珍贵财富。

一个30年，一个90年和60年，一个160年，是我们学科建设赖以支撑的全部历史。

我国是一个拥有马克思主义哲学近90年历史的东方大国。在已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160年的历史上占有90个春秋不算少了，特别是中国共产党执政近60年，毛泽东同志等一批杰出理论家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作出了独创性贡献，更加重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这门学科的分量，学科建设中尊重历史的原则也就更为重要了。恩格斯说过：历史就是我们的一切，我们比其他任何一个先前的哲学学派，甚至比黑格尔，都更重视历史。我们要重视160年的历史，更要重视近90年的历史，尤其要重视近60年和近30年的历史。历史是过去的现实，现实是未来的历史。历史集中了人类的智慧，历史也开辟了创新的前途。重视历史，不仅是重视前人的智慧、重视一脉相承，也是重视开启未来的钥匙，重视继往开来、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的前景。

灾难锤炼了我们民族的意志

□李文海

中国灾荒的频繁性、复杂性、严重性和广泛性，在世界上可以说是颇为少见的。一部二十四史，几乎就是一部中国灾荒史。而一部中华文明史，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一部中华民族与自然灾害不断抗争的历史。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在谈到黄河下游古代中国文明的起源时这样说过：人类在这里所要应付的自然环境的挑战要比两河流域和尼罗河流域的挑战严重得多。

在极其严酷的自然环境下，频繁而严重的灾荒固然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无比深重的劫难，但也恰恰成为激励中华文明生长、绵延的一种积极力量。中华民族从很早的时候起，就不再匍匐于自然灾害的淫威之下，而是发展出“天定胜人，人定亦胜天”的思想，与灾荒进行了不间断的、不屈不挠的抗争，为后世留下了许多宝贵的历史遗产。

早在社会生产力还很低下的时代，就有人对消极祈禳弭灾的观念和活动进行了批评，形成了具有朴素唯物主义意味的灾害观。荀子明确说，“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东汉王充坚决反对把自然灾害的发生加以神秘化的灾异谴告说。南北朝时期的《颜氏家训》中亦声称：“日月有迟速，以术求之，预知其度，无灾祥也。”所有这些认识，都冲击了天命主义的灾害观，也成为中国古代积极进行抗灾救荒的思想基础。

与灾害观的发展相对应，关于采取怎样的有效措施来进行抗灾救荒的思想也很早就出现了。成于战国时代的《周礼》提出“以荒政十有二聚万民”，其内容包括：“一曰散利，二曰薄征，三曰缓刑，四曰弛力，五曰舍禁，六曰去几，七曰眚礼，八曰杀哀，九曰蕃乐，十曰多昏，十有一曰索鬼神，十有二曰除盗贼。”这是我国历史上首次提出的较为系统的荒政思想。除了“索鬼神”，其他各项大体涵盖了政治、经济和社会等方面切实可行的措施。差不多同时代的《礼记》，更明确阐述了积储备荒的必要性。这类思想在后世得到进一步发展，尤其是到了明清时代，救荒思想的内容更为丰富，也对当时荒政制度的建设起到极大的指导作用。直到今天，其中仍不乏值得借鉴的真知灼见。

我国积累了世界上可谓独一无二的、大量的灾害史料。在先秦时代的《竹书纪年》、《春秋》、《左传》、《逸周书》等典籍中，就保存了相当多的灾害史料。《汉书》首创灾害专志“五行志”，开正史记录灾害之先河，后来的正史中几乎都有专门篇幅辑录历朝历代的灾害史料。不仅如此，我国另外一项独有的史志编纂传统即地方志的修撰中，也都有“灾祥”、“灾异”等专章记录本地区灾害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正史中灾害记录之不足。这些丰富的灾害史料，有助于我们总结、认识自然灾害的发生机理和规律。

我国在长期实践中形成了一套国家力量主导下的、相当系统而且周密的荒政制度。至少从秦汉时代开始，就已出现了许多专门应对灾荒的有效政策和行动。后来各朝代几乎莫不在重视和继承前代荒政经验的基础上，对这项制度又有所发展。特别是清代，更是集中国古代荒政制度之大成。当然，在更多的时候，无论多么严密的制度规定，都无法避免封建统治下操作过程的种种弊端。

我国还形成了重视总结救荒经验的传统。大约从宋代起，一批有识之士就开始系统地总结和整理源自官方和民间的诸多救荒经验和赈灾措施，并著录成书。据初步统计，迄至清末民初，此类救荒专书约有250余种之多，其中如《救荒活民书》、《康济录》、《筹济编》、《荒政辑要》等，均被当时的统治者奉为救荒圭臬和赈灾指南，且多次刊行，流传颇广。这些救荒文献，一方面详尽记录了中国历史上重大灾害的实况及其对社会的影响，另一方面则通过对各级官府与民间社会历次救灾实践的实录和总结，颇为系统地反映了中国救荒制度的变迁历程，对于今天的人们深入了解各历史时期的灾害情况特别是救灾减灾的经验教训，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学术价值。在今天党和国家逐步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构建和谐社会的大背景下，它也可以从历史的角度提供极其珍贵的传统文化资源，为国家减灾救灾提供宝贵的借鉴。

中华民族是一个多灾多难的民族。这种民族灾难，既包括社会的，也包括自然的。但不论哪一种灾难，都从来没有把我们的民族压倒，都没有使我们的民族屈服。相反，灾难锤炼了我们民族的意志，昂扬了我们民族的精神，增强了我们民族的凝聚力。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正是在克服各种巨大灾难中不断奋起、不断前进的。

学者论坛

学术动态

自今年4月开始的中国古代文明探源工程蚌埠禹墟遗址项目第二次考古发掘取得重大进展，考古人员在遗址处发现一座面积约2000平方米的夯土台。同时发现的大量出土陶器为“禹会诸侯”历史提供了有力证据。图为禹墟遗址第二次考古发掘出土的部分龙山时期的陶器。　张建平摄

本版责任编辑：卫　庶　叶　帆　　电子信箱：lilunbu@peopledaily.com.cn

史学与文学有别之外的思考

□张耕华

史学是史学，文学是文学。史学必须以史实为依据，文学可以虚构想象。史学与文学的这些区别属于常识，没人表示疑义。然而，自后现代主义史学理论兴起之后，史学与文学的异同却引发诸多讨论。一些主张后现代主义史学理论的学者认为，历史叙事也是虚构。这就让史学与文学的界线变得模糊了。

面对这类观点，批评者会批评说：秦始皇是男的，不是女的；法国大革命发生于公元1789年，不是公元1788年，这些历史事实难道都是虚构的？它们难道会因史家的不同解释而不同？依此类推，主张后现代主义史学理论的学者犯的正是常识性错误。

不过，主张后现代主义史学理论的学者，尚不至于对诸如秦始皇是男的而不是女的、法国大革命发生于公元1789年而不是公元1788年这些基本史实发生怀疑。我们不妨冷静下来，探究一下其过激言词背后所提出的问题。

众所周知，真实的历史事实及其史料依据，是历史叙事的基本要素，是历史学的基础。历史学的任务不仅是考证历史事实，还应给出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和历史过程的完整面貌，进行较为全面或完整的叙述。为此，历史研究者需要把各种历史事实加以联结和组合。而主张后现代主义史学理论的学者认为，历史研究者可以在不违反学科规范的前提下，对历史事实进行不同的联结和组合。而这些不同的联结和组合，会形成不同的人物、事件或者过程的历史面貌。以法国大革命为例，历史学家可以在给定的事实范围里，在不违背学科研究准则的前提下，写成几种不同版本的法国大革命史。如果把事实陈述比作历史的砖瓦，把完整的历史叙述比作历史的大厦，那么，史学家应该可以依据同样的砖瓦建构成不同样式的历史大厦。

对于“学科研究准则”或“学科规范”，研究者应该有相对一致的理解；而“不同的联结和组合”是否符合历史本身，关键在于对历史规律的把握，对历史辩证法的认识。但“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后现代主义史学理论的有关观点也提醒我们，应该关注和研究“历史叙述的演化变迁”，也就是语言文字表达出来的历史在不同叙述者以及时代和社会条件的作用下所呈现的不断演化变迁的现象。从积极的方面说，这应该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研究历史学的学科特征和演变过程，从而引发史学研究的一些新视角、新探索。

学术随笔

深入研究中国共产党思想史

关志钢在《中共思想史学科建设初探》一文中指出，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涉及面很广，涵盖近现代中国经济、政治、社会、军事、思想、文化等各个层面，由此也衍生出中共党史研究的诸多领域，中国共产党思想史便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分支，又具有相对的独立性。严格地讲，中国共产党思想史，就是中国共产党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实际，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中国共产党思想史研究，肩负着全面叙说和真实再现党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的使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发展规律及其理论成果——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构成中国共产党思想史的研究对象和全部内容。深入研究中国共产党思想史的学科属性、历史分期、研究对象、研究重点等，是当前学科建设中的一个重要课题。

（摘自《深圳大学学报》2008年第3期）

《环境问题与第三世界》

贺新元撰著的《环境问题与第三世界》一书，已由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出版。

该书注重历史与逻辑相结合，运用大量国内外相关资料，从环境问题和第三世界发展这两个角度，系统研究了关于人类发展的“人同自然的和解以及人同人的和解”两大问题。该书认为，科学技术具有社会属性，一旦与进步合理的社会制度相结合，就能帮助人类实现人与人之间的和解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解。该书强调，可持续发展的底线是，起码要保证人类在生存权和发展权上的公平与平等。真正的可持续发展之路应该是：既能满足本国人民又能满足他国人民生存与发展需要，既能满足当代人又能满足后代人生存与发展需要，既能维护当代人的眼前经济利益又能维护人类的长远和根本利益。建设生态文明，对于实现人类可持续发展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陈艳平）

《市场社会主义：历史、理论与模式》

余文烈等撰著的《市场社会主义：历史、理论与模式》一书，已由经济日报出版社出版。

该书认为，市场社会主义是一种经济体制的理论概念或模式，是对将近一个世纪以来倡导和探索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道路与模式的笼统称谓。它在比较经济学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思想史中占有重要位置。该书主要探讨了市场社会主义历史发展阶段划分的方法和结论、市场社会主义的定义、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国外市场社会主义的联系与区别、市场社会主义对经济学理论的贡献、市场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等问题，并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该书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基金、中国社会科学院“精品战略”管理项目基金资助课题的研究成果。（晓　叶）

《企业劳动产权概论》

李惠斌撰著的《企业劳动产权概论》一书，已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

该书认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劳动者应该按照其对企业贡献的大小参与分割企业的增量产权（税后利润），企业按要素分配可以归结为按劳动分配。第一，由于资本的稀缺性，资本获取利息本质上是对过去积累劳动的报酬。第二，投资是一种风险劳动，承担风险的投资者必须十二分地关心企业，因而应该获取风险收益。第三，在现代企业尤其是现代股份制企业内部，除了纯粹获取利息的食利者，所有企业人员本质上都是劳动者，他们的关系本质上是劳动合作关系。第四，每一位普通劳动者除了获得工资收益，还应该获得类似于股权的产权收益。因为企业的税后利润在扣除了利息等之后的剩余，本质上是全体劳动者共同创造的，因此劳动者应该获得相应的产权。这些观点，对于进一步深化企业分配理论研究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孙承叔）

新书架

“中国生态文明建设高层论坛”提出——

走符合国情的生态文明建设新路

□维　述

教育部、国家林业局、中华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联合主办，广州市人民政府、广东省林业局承办的“中国生态文明建设高层论坛”，日前在广州市举行。论坛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遵循自然规律，努力走出一条符合我国国情的生态文明建设新路子。

走符合国情的生态文明建设新路。与会者认为，生态文明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确立人和自然新的关系，建立不同于以往的尊重自然、善待自然，与自然友好相处的人类社会新文明。建设生态文明，是我们党在对经济社会发展规律和人类生存环境深刻认识的基础上作出的重大决策，不仅对我国可持续发展具有深远影响，而且对维护全球生态安全、推进人类社会文明进程具有重要意义。建设生态文明，必须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立足我国实际，遵循自然规律，坚持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以及生态全面协调发展的原则，努力走出一条符合我国国情的生态文明建设新路子。

把资源节约和加强生态保护摆在生态文明建设的突出位置。与会者指出，建设生态文明，不是否定工业文明，而是要实现工业文明与生态文明的共赢。为此，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消费模式，加快推广应用节能减排技术，逐步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以及消费模式。有学者强调，森林是陆地生态系统的主体，林业承担着建设与保护森林、湿地、荒漠生态系统和维护生物多样性等多项职责，在转变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以及推动全社会牢固树立生态文明观念等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建设生态文明对林业提出了新要求，也给林业发展带来了新机遇。林业生态建设面临的机遇，需要全社会共同来把握。只有形成全民动员、全社会办林业的局面，爱林、护林、兴林蔚然成风，我国才能实现建设秀美山川、实现生态良好的目标，生态文明才能变为现实。

建设生态文明是全社会共同的责任。与会者指出，生态文明建设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进程。生态文明，基础是建立良好的自然生态系统，前提是全社会树立生态文明观念，核心是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建设生态文明，关键是处理好保护生态与发展经济的关系，其过程就是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的不断转变。因此，应当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决策，使之进入生产和消费过程，进入人民的生活。要通过大力宣传，使全社会认识和了解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性、紧迫性以及与自身利益的关联性，使生态文明建设成为全体社会成员的自觉行动。

学术交流

“中国改革开放30年暨博士后科学论坛”在京举行

北京大学主办的“中国改革开放30年暨博士后科学论坛”近日在北京大学百年讲堂举行。来自我国自然科学界和社会科学界的百余名专家学者参加了论坛。与会者指出，在邓小平同志的关怀下，中国博士后制度于1985年正式建立。20多年来，我国博士后制度从无到有、逐步完善，为国家建设和社会发展培养了大批高素质人才，在促进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古　月）